

提防向善之心“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

怡然



新民时论

临近节日，舆论再次频频触及“节日反腐”话题。此时，我联想起全球廉洁度长期领先的瑞典。这个北欧国家的政务公开制度实行200多年来，由全体人民监督政府，人们对官员哪怕多捞多花公家的一个克朗也不能容忍，致使贪腐行为几近绝迹。

孰料，近年来瑞典竟也屡屡爆出公款消费、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譬如，瑞典经济与地区发展署常借开会之机，包租庄园、游

艇，组织豪华晚宴，享受滑雪等娱乐活动，违规花费1650万瑞典克朗。前年，这个中央机构在当地高档酒店召开年会，一天会议支出达113万瑞典克朗，其中晚餐花费超过42.8万瑞典克朗，人均超过1470克朗。而根据瑞典政府的规定，晚餐最高标准为每人600瑞典克朗。

如此严苛的法令、严格的制度、严密的监督，何以还有“吃公”乱象发生，还有贪腐土壤客观存在？对此，瑞典舆论进行了反思。瑞典反腐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虽然法律法规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但再完

善的制度也有漏洞可钻。这跟瑞典社会流行的只重结果、不重手段的实用主义有关。任何泄露团队中负面消息的人都被认为是“叛徒”和“告密者”，导致可能发生互相包庇的腐败窝案。因而，欧洲委员会下设的反腐败工作组去年底发布报告指出，瑞典政府应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以防产生体制内互相包庇的情况。

无独有偶。近日，中国一家央企有职工为举报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自曝本单位的一份节日送礼清单，竟被同事斥为“品德败坏，过去讲就叫叛徒”。何其相似乃尔！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甚至双方都有科学家从生理解剖学角度给出证据。但无论如何，西方俗谚“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并非无稽之谈。而如果说人性有先天缺陷，后天因素则更不容低估，诚如歌德所言：“人类尚不完善的向善决心，总是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法治层面的制约、制度层面的防范固然不可或缺，但人的心理、社会道德所起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有鉴于此，习近平提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结合。他在强调“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的同时，指出“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良好的法治环境里，健全的制度与严格的管理，可以把人性之恶的空间挤压到最小，而把人性之善彰显至最大。但是，注重提防向善之心“屈服于根深蒂固的习惯”，却是一个日常而恒久的课题。

眼下，在查办贪腐案件、惩处违纪违法人员时，有些纪检部门已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从分析人性弱点入手，究其社会道德范畴的根源，这就非常

明智。最近，广州市纪委在研究“节日反腐”问题时，着重分析了中国人情社会的相关特征，深入剖析节日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他们认为，亲情重于礼法，是人情世故的基本特征，以情谋私是人情社会的功利特征，基于血缘、乡缘、学缘、业缘这四个圈子，是人情大行其道的基本依托。这种人情往来的风俗习惯，使一些干部混淆了礼与贿、情与法的界限，这种风俗习惯严重侵蚀干部的廉洁性。这样的认知，以及随之而来的有效举措，对于推进廉政文化的建设，扬清激浊、扬善抑恶，大有裨益。

下级批评上级

任大刚



结舌者言

5月份，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参加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了大实话：“入党31年以来，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辣味的民主生活会。我干县委书记十几年了，从来都是我批评别人，这次也尝到了被别人批评的滋味。”

专题民主生活会之前，王新军十几年没有受到过别人批评，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可以想见，在一县一区之内，“一把手”官职最大，其余都是他的直接下属。一名直接下属要批评上级，首先要确保所批评的事情是真实的，其二要确保不被上级报复。同时满足这两条，下级批评上级才有可能。

但很多时候，这两个条件并不同时具备。一般情况下，下级掌握的信息不如上级全面，很难了解全貌，很可能批不到点子上，反使自己陷于被动。在科层体系内，上下级之间在伦理上存在命令和服从关系；下级的升迁、业绩评定，往往绝对掌握在上级手里；此外，两者所能动员的资源也大不相同。种种条件约束，导致下级不敢轻易批评上级，除非经过长时间的检验，认定上级心胸开阔，宽宏大量，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否则哪个下级敢贸然批评上级？

所以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叫“下级监督上级——太难”，这个总结是确当的。

而实际上，在传统意义上，上下级之间不仅监督难，相处亦难。韩非子从一则故事中，了悟了上下级关系之不易。

话说楚庄王的弟弟春申君有个小老婆叫“余”，正妻生的儿子叫“甲”。余想要春申君抛弃正妻，便弄伤自己的身体，跑到春申君那里哭告说：“我能够做您的小老婆，感到十分幸运。但

是顺从了夫人就没有办法伺候您，顺从了您就没有办法伺候夫人。我的能力实在有限，不能够同时伺候两位主子，与其死在夫人面前，不如让您赐我一死，我死了之后，您喜欢上身边的其他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我的难处，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

余的这番情感讹诈吓住了春申君，为了这个小老婆，春申君抛弃了正妻。

余又想杀掉正妻的儿子甲，以便让自己的儿子做继承人。瞅准机会，她撕破自己的内衣跑到春申君那里，哭着说：“我得到您的宠爱已经很长时间，甲又不是不知道，今天他竟然强行调戏我，我极力抗争，以致撕破了衣服，这个儿子如此不孝，罪行实在太大了。”春申君大怒，杀掉了甲。

韩非子从这个故事中，读出很悲伤的意味。他认为，夫妻、父子之间尚且如此容易被离间关系，以致引起废黜和杀戮，比夫妻父子关系疏远得多的上下级关系又能怎样呢？而且同僚之间还经常到上级那里去进谗言，这种情况下，如何很好地维持上下级关系？商鞅在秦国被车裂，吴起在楚国被肢解的惨剧，就是这个道理。韩非子的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从他的法家立场出发，韩非子进一步认为，但凡做下级的，有过错或罪过，都不想被揭发惩处。贤明的上级，不会把奖励给没有功劳的人，惩罚必定降临有罪错的人。然而那些懂得法度权术的人还是被左王的奸臣所害，这并不是贤明的上级不能听从他们的意见。

韩非子明显把问题归咎为同僚之间的相互倾轧，上级似乎没有多大责任。在君权时代，这个看法符合其君权至上的价值观。但在人民主权时代，上下级之间只是法定职位的不同，不是伦理上的主奴，没有被下属批评过的上级如果仍然大量存在，则传统的尾巴还拖得有点长。

不要让“投票”绑架了童心

朱绩崧



北窗絮语

吃过晚饭，刷刷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在“呼救”，原来她要大家去投票，投给她读幼儿园的女儿所画的一幅蜡笔画。我点开链接，弹出一张作品，小家伙画得色彩明艳，充满童趣，我就点了“支持”，随即去跟同事“汇报”；投票任务圆满完成！谁知朋友谢过我之后，又吞吞吐吐提出一个小要求：你是教书的，学生多，能不能让你的学生们也来为我女儿投投票啊？

原来，这家幼儿园在举办绘画比赛，而评比办法就是让网友通过微信来投票，得票最多的作品就能获奖。乍一看，这意图挺好，借助先进手段，把仲裁权从园长、班主任手里释放出来，让大众评判，杜绝偏私，确保了公平、公开、公正。

可是，实践起来，这种做法真能尽如人意吗？显然不可能。回顾我们自己的社交网络平台使用习惯，一年里有几次会特意去看某家幼儿园开的微信画展呢？这个频率极低。就我而言，趋于零。那些专程投票的，不是家长，就是家长的亲友，这个人脉圈的核心无非是参选的孩子。

而投票呢，很粗鲁，就是看数量，而且很多系统允许隔日再投。“老兄，你送佛送到西吧，明天叫学生们记得再投一下哦。这样得票就能翻倍了。”好家伙，我成临时招募群众演员的啦？

就在我犹豫之际，另一位朋友转来一则微信帖子，看标题，又是此类“投票”，这回是某外国语小学评选优秀作文，我点开一瞧——这作文叫人怎么看呐？手机屏幕本就不大，老师也偷懒，拍张照片就给贴了上来，密密麻麻一片铅灰色，哪里看得清学生写的是祖国山河还是时代风貌。

“转这个给我干吗？”我问这位朋友。“不是让你看作文。亮点在最后。”他说，打了个戴墨镜的笑脸符号。我手指一划拉，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一篇东西，浏览数20000朝上，点赞将近5000。“怎么可能？”我问。朋友扔出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对话遂结束。此际，这七个字直让我摇头叹气。

是啊，作文与绘画的背后，可不都是父母心嘛。为了让孩子稚嫩的心灵不要过早遭受“失败”的洗礼，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有人脉的东告西，没人脉的还有“淘宝”买赞这招撒手锏。就这样，你追我赶，各显神通，幼儿园、小学原本不为外界关注的小规模内部竞赛悄然在网上红火起来。

可孩子呢？无论是折桂夸奖，抑或名落孙山，有几位大人真正关心过他们智力的创造究竟哪里可图，何处堪点呢？由此看来，这种“伪民主”评选之风，切不可长。家长劳心费神不说，对儿童的心理发育更多不利，因为这简直就是在告诉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家庭能调动多少社会、经济资源来把你捧红。日长时久，岂不个个养成“二代”心态，沦为纨绔子弟？这样的“投票”，与公平已无多大关系。相反，那是在绑架“童心”去向“只重效果，不问过程”的功利思想屈服。

现在的基础教育在具体执行策略上，托赖技术进步，花样比过去繁复不少，而且还增加了家长融入配合、接受“再教育”的成分。不过，技术有时带来的是便捷，有时也会留下浮躁的漏洞。对后者，执事者不可不察，以免贻害后世。

从无知到爱上 只差一个机缘

李泓冰



余烬录

我们的国学教育，其实被诟病久矣。近来，由于习近平的反复强调，国学的倡扬，再次被郑而重之地反复掂量。

习近平引人注目地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研讨会，提出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四项原则”，细想下来，国学的意义，就是他所提出的“传承的价值观”、“文化基因”以及“独特标识”吧。倘若这些元素在孩子们心中消失殆尽，五千年古国的文明靠什么才能瓜瓞绵绵？

国学，在当代中国，受过形同灭顶的冲击。一是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孔夫子、线装书、丝竹管弦等“四旧”固然统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像尊师重道、礼义廉耻等伦常纲纪更是彻底废弛崩坏，中华文明流传数千年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遭受巨细无遗的摧毁。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曾率众赶到曲阜，直接冲击被尊崇了千百年的孔庙、孔府、孔林。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更从北京打电话报称，“孔坟可以挖掉”。谭厚兰们砸毁了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故址，刨平孔坟。这个可怕的场景，是中华文化命若悬丝的缩影。

西学的东渐，固然给咱们带来了现代化，让国人从农耕时代骀驖一跃，但是挟经济强势呼啸而来的文化上的欧风美雨，也把传统文化冲决得羞惭无地、立足不稳。

中国大陆从上世纪80年代恢复中断了四十年的祭祀，将孔夫子的形象从彼时被羞辱中刮垢磨光，到了今天，更被最高决策层郑重尊崇，这让人温暖而踏实。

确实，我们早就在享受没有线装书，没有长袍马褂，没有轿子，没有三房四妾的封建遗存，然而有网络、

“爱宠”，有动车、高铁，有韩国明星的现代生活。那么，再没有了唐诗宋词，没有孔子屈原，没有昆曲京剧，没有秦砖汉瓦，没有长城、黄鹤楼，没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些“无用”的东西，究竟要不要紧呢？且弱弱地问一句，作为中国人，除了洗不白晒不黑的黄皮肤，剪不断理还乱的黑头发，在多元的世界里，我们还能拥有什么？我们及我们的孩子，将从哪里得到民族自信民族魂的滋养？从何处欣赏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曼妙？

其实，传统文化本身就有无穷魅力，孩子们只差一个爱上的机缘。一直记得，经白先勇手创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姗姗走进大学校园，观者如堵，一票难求，有大学生惊呼：“从无知到爱上，就在那么一个很短暂的过程，太美妙了！”

然而，像昆曲这样，一个早已从绝大部分人的视野及生活空间中退出的、行将消亡的，且看起来在升学、就业中一无用处的艺术品种，如果不是白先勇这样殚精竭虑，怎么可能有机缘挤进早已忙得不堪的中小学生的课堂？而他们的家长，很多自身就在文化断层甚至是传统文化的真空地带长大，对之没有接触，没有感情，更没有认同，怎会愿意自己的孩子去亲近那莫名其妙的咿咿呀呀？

如果从学校到家庭，都断了这份念想，先人苦心孤诣琢磨出来的这些精妙玩意儿，孩子们又怎可能有“爱上”的眼缘？

那么，不管是孔子还是屈原，不管是秦砖还是汉瓦，从学校、家庭到社会，都不妨给孩子们一个选择的机会，一个“爱上”的短暂过程，至少让他们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面前，不再那么“无知”——这点念想，看来随着决策层的强力推动，有了实现可能，且让我们乐观期待。